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

1999年10月6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上午10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10(续)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A/54/1)

主席(以英语发言):会员国将忆及秘书长在1999年9月20日第4次全体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他的报告。

特洛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科菲·安南秘书长在9月20日向大会介绍他的报告时,请会员国理解鉴于去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他决定讨论联合国在下一个世纪的各项责任。因此墨西哥代表团此刻想把其评论限于秘书长对大会的讲话。

秘书长今年的报告当然涉及了与联合国生活有关的各项不同主题,但其做法的意义值得特别注意。墨西哥代表团将在本届会议期间讨论各相关议程项目下讨论报告所涉问题时提到这些问题。

秘书长申明,他根据自己对恢复联合国在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应发挥的作用负有的最高职责来表达他们关注的。他要求各会员国理解当今世界的各种聚合与矛盾的因素,以及他们对本组织的要求。中心的问题似乎是:在二十一世纪,使用武力的参数应是什么?

联合国当然已经历了美好时光和不美好的时光,其中有些具有戏剧性。最近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是秘书长的关注和评论的根源。

墨西哥一贯表示——我们在今年的一般性辩论中再次这样说过——为自己的多样性观点感到自豪,这是历史、信仰和经验的的结果。我们一贯认为联合国是

一个理想的讲坛,可以提出将使我们能够克服集体挑战的解决办法,并就此达成协议和加以执行。

毫无疑问,《旧金山宪章》作者们头上曾笼罩着战争阴影,但我们必须对本组织创始者的想象力、崇高见解和远见表示钦佩。如果没有《旧金山宪章》,我们今天是否可能设计一个国际结构——无论这个结构有多少局限性和有多少不足之处——在保健、儿童、教育、环境、金融、贸易、电信和许多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组织我们的活动和关系?虽然本组织不如我们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强大,虽然在天边布满了暴风云,然而在五十四年里,在预防核灾难方面难道本组织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吗?

聚集在这个大会堂的有188个会员国——比创始时多出137个——代表,难道这个事实不正是联合国最值得称赞的成就之一——非殖民化进程——吗?难道有任何人可以否认这是因为明确承认主权原则和各国人民自决的结果?在冷战结束后,难道不是联合国在调整和控制国际关系的复杂转变吗?难道不是本组织提供了最好的论坛,在这个论坛里,各方面都可以共同努力,设计和制定包括新旧政治问题的新议程,并在这个论坛里,从质量和数量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只是墨西哥坚定地支持《旧金山宪章》各项宗旨、原则和规定以及我国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的部分原因。

我之所以作上述发言,是因为墨西哥深信,不能而且不应该以支离破碎的方式分析和审议本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前景。事实上,1945年建立的安全制度的中心点

就是使用武力。但今天,联合国、我们在联合国周围建立的机构和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有多大的局限性和出现了多少失败——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财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加以利用,我们所有人都对其负有责任。

我们在寻求对当今各项挑战应作出的反应时,在制定今后行动的前景时,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过去,铭记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必须充分意识到我们所作各项决定的后果和影响。我刚才所说的共同财富也是我们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墨西哥外交部长罗萨里奥·格林女士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指出:

“我们日益关注地注意到,冲突非但没有消失,而且由于国际上力量的重新组合,冲突成倍增加,其性质已经改变。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不断扩散的对峙往往是国内对峙,对一个为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建立的组织而言,这些都是难以克服的挑战。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授权,在如何解决这种新的状况方面仍然没有明确的协商一致意见。虽然在最终目标——和平——方面我们没有分歧,这种状况往往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使我们产生分歧。鉴于没有任何一项政治契约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墨西哥仍然坚定地认为,寻求解决国内和国际冲突办法的努力必须符合《旧金山宪章》的文字和精神。不得以各种情形或因单方面的喜好对其原则进行各取所需的解释。我们不能允许破坏本组织的权威或合法性。我们不能接受公开违反创始者意图或削弱国际社会权利的行动。

“墨西哥一向认为,即使是出于最崇高的人道主义考量而使用武力,使用武力不是解决办法;相反,使用武力只能进一步制造不稳定、不确定和暴力。但在安全理事会严格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时,我国一向表现出克制。即使如此,墨西哥政府重申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并坚决驳斥存在所谓干预权利,特别是驳斥在国际法框架以外存在这项权利的说法。

“这是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期时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实质上,我们正在努力根据曾经鼓舞了《旧金山宪章》作者们的思想给予联合国政治支持,使联合国能够面对和平与安全遇到的各种新威胁。如果我们失败,我们有可能破坏国际谈判工具,铸成我们所希望避免的大错:削弱本组织。”(见A/54/PV.11)

秘书长提醒我们,《宪章》序言部分指出“非为共同利益,不得使用武力”。秘书长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似乎是,正如他所说的,由于冷战结束以及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主权和主权国家的定义被重新界定,因此国家与个人关系也被重新界定。

毫无疑问,这些主题都是当代所关心和所思考的主题,深入讨论这些主题所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分配给本届大会整个会议的时间。正如新加坡外交部长所指出,重新确立政府和国家概念需要彻底改变强者和弱者的心态。他还指出,这将是困难的,是痛苦的。我冒昧地补充说,在这个会议厅内,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会发现代表们中至少有188种不同的见解。

墨西哥代表团赞赏秘书长9月20日发言(A/54/PV.4)中所表现的理性的诚实和勇气,我们完全支持他的发言所提出的明确目标:在新千年期里恢复本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应有地位。

秘书长在发言中向我们提出五个问题:什么是共同利益?由谁来确定共同利益?由谁来捍卫共同利益?需经过谁的授权?应通过什么手段?

正如秘书长本人所指出,这些问题确实是“重大问题”。由于事关重大,所以应该认真重视和审议这些问题。虽然我今天在此所作的发言自始至终都具体提到这些问题,但我们仍然认为,由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必须进行认真、客观和负责任的反省。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墨西哥外交部长呼吁所有会员国开展一个集体思考进程,使我们能够纠正冲突所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与本组织作出反应的能力之间的差距。(A/54/PV.11)。

从这一点可以明确看出,墨西哥政府认为,回答秘书长提出的问题是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迎接秘书长提出的挑战并不是任何个人、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五个或十五个国家的责任;这是所有会员国的责任。就墨西哥而言,这是一项绝对要求,是只有大会才能承担的义务。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期之际,平等、正义和民主的原则必须以联合国信誉、合法性、道德和道义权威为基础,这些原则将仍然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国与国之间法律上的平等地意味着消除或者至少限制已经过时的各种特权。这也明确地意味着必须真正承认,必须在普遍接受的规则框架内以理智和多元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代替利害关系——或代替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进行统治和奴役的诱惑,也就是说,必须没有选择地充分遵守国际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规定的各项义务。

正义要求对国际合作作出重大承诺。人类社会今天已经有足够资源满足我们这个星球居民最紧迫的需要,人类社会也应该利用这些资源满足这些需要。

历史表明,最极度的贫困和需要也是造成冲突的最肥沃土壤。秘书长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修补的代价往往超过预防。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符合所有方面的利益。“疲劳”看到的只是短期利益。塞迪略总统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讲话时指出:

“和平与发展是分不开的,安全与繁荣是分不开的。我们撒下发展的种子,收获的将是和平。”
(A/50/PV.36,英文第17页)

在我们各国生活中,必须将民主作为追求的理想。与此同时,在世界日益相互依赖和全球化之际,在一个自认为已经文明、从而不会将单一的模式或某一特定见解强加给所有方面的国际社会,民主的道义和道德要求必须贯穿所有关系。

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必须确定本组织是以理智向前迈进还是以武力向前迈进。无论如何,请允许我在此引用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

“如果说全球发生的事件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就必须加强我们的行动。如果必须改革本组织,以保证其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改革本组织。但我们必须集体来做,并且尊重国家平等的法律原则。我们不要使这个论坛丧失其威严或影响力。墨西哥忠于对《旧金山宪章》文字与精神的承诺,决不后退。相反,墨西哥将积极参加各种努力,以保证联合国的活力,从而为我们自己以及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A/54/PV.11)

墨西哥是一个深信对话是国际关系中最好工具的国家。当对话涉及到本组织的未来时,我们深信,对话必须包括每一方。因此,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恭敬地请求你以大会主席身份开始与各会员国进行协商,讨论什么是进行集体思考的最好机制,思考大会可以如何组织起来,响应秘书长提出的挑战和问题。

秘书长提出的各项问题的重要性、含意和后果要求就如何迎接这些挑战进行初步交换意见。主席先生,我们充分相信,你有智慧和领导能力,开展这个重要进程。

舒马赫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和他的同僚提出的全面报告。为迎接去年的各种挑战,联合国作出了巨大努力。确实,出现的问题繁多

而且严重,超乎寻常。秘书长本人在报告中将过去十二个月称作“动荡的”十二个月,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我谨以我国政府名义对本组织在这段时期内所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和尊重。报告提供了确凿证据,证明我们需要改变对我们必须处理的一些复杂和多层面问题的反应。

秘书长将他的报告引言部分称作“面对人道主义挑战”。确实,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目睹了超乎寻常的自然灾害和战争。除其他外,我谨提到土耳其、希腊和台湾所发生的灾难性地震,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受灾难,我还谨提到中美洲米切飓风造成的巨大破坏。我国公民对这些灾难非常关注,并作出了反应。然而,德国和许多其它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因此,我们欢迎报告强调必须从“反应文化”转变为“预防文化”,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关于创造这种“预防文化”的呼吁,其目标不仅是预防冲突和人为灾难,而且是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其他灾难造成的后果。

我国政府充分准备在联合国框架内作出自己的贡献,以实现秘书长关于发展该预防文化的目标。事实上,我国政府已经促进通过了关于预警的两项决议,在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框架内已经执行这两项决议。我还谨指出,这个进程导致于1998年9月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了关于预警制度的减灾十年会议。德国正在考虑进一步采取步骤,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关于人为灾难问题,我谨重申秘书长的思想,这就是最好的长期预防战略似乎是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善政和民主是——用秘书长的话说——“国内管理冲突的非暴力形式。”

在过去十二个月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增加了4倍。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日益发展成为复杂的建立和平行动。巴尔干南部地区和现在东帝汶地区的危机对联合国提出了全新的维持和平挑战。科索沃国际行动规模巨大,异常复杂——这基本上是管理一个被战争破坏殆尽和人口流失的整个省份。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244(1999)号决议后的数月里,联合国已开始证明它有能力完成授予它的任务——条件是各会员国向它提供必要的资金、资源和权威。

除其他事项外,德国通过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派遣律师、男女警察和教师,努力对这种从简单维持和平行动向多功能建设和和平行动的发展作出反应。德国准备对处境十分困难的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作出类似的贡

献——例如,协助建立一个司法系统。两天后,德国的克劳斯·莱茵哈特将军将接任驻科部队司令职务。这一事实的最大象征意义是,德国愿意接受它在国际和平努力中应承担的责任。

毫无疑问,科索沃对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这也强调说明这个自明之理:会员国希望联合国有多强大和有大决心,联合国才能有多强大和有多大决心,或者说会员国允许本组织有多强大和有多大决心,本组织才能有多强大和有多大决心。在这方面,我谨呼吁所有会员国不仅无条件地充分支付其会费,而且按时支付会费。

秘书长不无批评地提到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危机方面的一般做法。他认为,在预防外交方面,联合国过于犹豫不决。我们经常面临各种局势,在这些局势中,如果安全理事会采取比较坚定和具有远见的行动,就可能可以预防冲突。

在此,请允许我提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到“残酷地无视人道主义准则”问题。他还详细地讨论了主权和不干涉与人权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不错,国家主权将是而且应该是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但是,不干涉内部事务概念不应理解为公然违反国际承诺并危害本国人民利益的行为大开绿灯。如果人们不再认为本组织是人权的倡导者和保护者,那么联合国的声誉和人们对联合国的接受程度将会受到考验。我们鼓励并且支持任何关于如何使人道主义干预符合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任务的讨论。

秘书长提到联合国内一系列改革项目。德国坚决支持他的努力。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组织,如果不能不断进行改革,就不可能生存。联合国必须面对这种不断改革的需要,才能继续发挥影响力,才能继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赞赏秘书长自上任以来将改革和提高效率作为其议程的最优先项目。

在这方面,我谨重申,我国深信,安全理事会改革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能够依赖一个有效率的联合国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应该能够有权威代表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然而,安全理事会改革不会自行发生。这方面的讨论已经进行了若干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会员国的政治意愿和务实精神,取决于会员国是否相信,安全理事会改革不仅符合联合国利益,而且符合各会员国利益。在这方面,菲舍尔外交部长和在今

年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许多发言者提出了合理的主张,应该在主管论坛讨论这些主张。

秘书长在报告中概述了全球化的不同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个现象。我们都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但我们也必须面对它带来的许多不利因素。今年早些时候,在科隆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讨论了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其结果是,就负债沉重穷国减免债务方案达成了协议。

德国同意秘书长对跨边界非法活动增加的关切。在欧洲联盟一级已经作了许多打击超国家犯罪的工作。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可作为成功打击国际犯罪活动的例子——作为典范。

在这方面,我谨表示希望,有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两项法律文书的工作将在本届大会期间最后定下。德国一贯支持缔结一项禁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和一项制止向恐怖主义者提供支助的国际公约。我们认为,这两项公约是打击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适当手段。

在《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之际,科菲·安南秘书长敦促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使正义全球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公约》的通过是——我在这里援引我国部长在大会上的讲话——

“发展国际法的飞越。我要求各国尊重该《公约》的完整性,签署并迅速批准它”。(A/54/PV.8)。

我们都知道秘书长报告的时期是特别困难的时期。但是我怀疑国际社会将在今后12个月中面临较少问题。相反,新千年可能带来更多的挑战,联合国在处理这种事态发展方面将更不可缺少。因此,德国全心全意地支持秘书长有关加强本组织和发展新的预防冲突手段的呼吁。让我们作为会员国共同帮助联合国更好地集中完成今后的任务。

巴尔迪维索(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编写并提交载于文件A/54/1的报告。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表达了其立场,并参加了该文件所述问题的讨论和发展。我们将在全年继续提出我国政府的立场和关切。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对秘书长9月20日参加一般性辩论时提出的想法作出反应,这些想法还载于我们面前报告的序言中。

他提到的人道主义挑战是哥伦比亚国家主要关切之一。这些是自然灾害的后果——最近的自然灾

害是今年稍早时哥伦比亚产咖啡地区地震,这次地震使2 000多人死亡,10万多人受伤——也是哥伦比亚政府加紧和平解决的武装冲突的结果。

今年是联合国在各方面面临巨大挑战的一年,这些挑战触及每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这些挑战中,人道主义挑战的增加十分令人震惊。本组织必须以国际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不幸地将正常情况下拨给发展的资源转用于人道主义行动。

以综合方式处理人道主义挑战的任务远远超过联合国系统的反应能力。矛盾而令人沮丧的是,本组织的更大参与不一定导致自然灾害或战争及武装冲突造成的全球人道主义情况改善。每当出现严峻人道主义局势时,本组织也必须用一切必要手段克服结构限制。

哥伦比亚认为在联合国限制和人道主义危机许多要求之间实现适当平衡的一种方式是在巩固同合法国家政府的积极、不间断和坚实的合作制度,旨在寻找解决办法。联合国在人道主义干预中的限制得到大国之间的援助的补偿,我提及的合作制度则不同,它要求各国政府感兴趣并愿意参加防止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这种假设基于一个前提,即任何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作为一般规则,必须是有关国家可以接受的。

联合国系统同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应是不间断、稳定和持续的,不应限于危急局势。在没有对联合国系统至关重要的活动时,联合国不应执行可消极影响内部进程的任务。这种想法是建立合作制度,并设立适应国家、区域和当地情况的联合国行动机制。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之间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我们便可设立有效的机制,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方面促进国际连贯性,并保证我们的短期和长期预防灾难和冲突战略获得成功。

评估本组织预防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工作一个困难是根据政治或地理考虑进行评估。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他说人的需要必须是人道主义危机中唯一正当标准。本组织的办事处、人员、设备和预算都必须为这项任务服务,并适当考虑到有些政府愿意并承诺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理解,一些国家解决和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行动有时受政治动机的影响。但是这是必须承担的风险,因为约束联合国发挥对一些危机方面往往十分有限的技术作用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支持更公开和参与性的人道主义行动决策机制。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联合国应在制订具体目标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让我们选择正确、准确、严格以及最重要的是及时的接近实际情况的领导。让我们使本组织人道主义工作成为最有效率的工作。让我们避免这一问题官僚化,特别是让我们保证联合国系统的回应由人道主义危机的现实和真正严重性决定,而非由其机构和组织激烈竞争决定。

瑞安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秘书长再次提出一份振奋人心和全面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他广泛地介绍了联合国各项主要成就,但是更重要的是,恰如爱尔兰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所说,秘书长为我们准确地诊断了本组织面临的挑战,并指明了今后的任务。

这一重要报告有益地推动了今年特别重点突出的一般性辩论,许多发言者明确和常常发人深省地谈了我认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仍然面对的主要挑战:即如何最有效地应付严重影响当今世界的各种政治、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报告还考虑了如何最有效地制订旨在预见和防止这类危机的战略。

秘书长正确地指出,政府机构,不论是国家或国际的政府机构,还需要排除建设成功预防所必不可少的那种必要的跨部门合作的障碍。但是,我们必须赞扬秘书长所进行的改革,其中许多已在联合国内跨部门合作中取得成功。

如果我们考虑联合国直接参与的各种冲突,我们必须问自己: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我们可利用的一切手段,我们是否可能限制这些冲突的规模,减轻它们所造成的人道主义悲剧?这些都不是新的手段,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些手段。遗憾的是,它们往往被忽视,或者得不到充分利用,后果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最重要的手段或许是早期预警。正如秘书长正确地指出,它是现在普遍同意的有效外交的一项必要条件。或许需要进一步努力,帮助解除那种担忧,即早期预警行动构成对于国家内政的干预,或者被视作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侵犯。

这方面,我们仔细地注意到秘书长在一般性辩论开始时发言中指出,我们有困难将《宪章》原则应用于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中严格的传统主权观念不再适合各地人民实现基本自由的正当愿望。

或许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最有效地加强早期预警机制。过去几年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表明,在该领

域仍然有分歧。现在是否应该考虑能够商定和接受哪些是一项有效的早期预警战略的内容,并可在或在哪个阶段启动?

爱尔兰代表团认为,一项有效的早期预警战略的必要内容应该包括如下:第一秘书长从在事件可能导致冲突地区的接触中收集的资讯;第二,国际和区域组织向秘书长和联合国成员提供的资讯与分析;以及第三,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情报资料。

如果这些情报表明,如不采取紧迫行动,冲突即将爆发,安全理事会可同秘书长协商,考虑向冲突地区紧急派遣安理会成员特派团,以报告可立即采取那些步骤,预防危机升级。我们认为,这种特派团的报告可加强安理会审议和最终行动的信誉和权威。

今年早些时候,爱尔兰曾有幸主持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经过三年谈判之后,以协商一致通过了一套切实的裁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收集、控制、处理和销毁小武器和轻武器等问题。这些措施虽然对冲突后局势有特别意义,但是它们对正在走向解决的冲突、最近已经结束的冲突,和因此对预防冲突死灰复燃,也有特别意义。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是说明联合国机制如何参与重要领域成功地作出实质性理论贡献的一个小小例子。如果应用适当,这些措施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可减少暴力的潜能,加强稳定,进而便利发展进程。在这方面,爱尔兰欢迎重新建立裁军与发展指导小组。

在一般性辩论中,许多发言者强调解决冲突根源的重要性。爱尔兰完全同意在制定必要战略结束一场冲突和开始冲突后缔造和平的进程时,这绝对必要。毫无疑问,冲突的根源之一常常是长期欠发达,导致经济边缘化和贫困。

这方面,许多正走出最近冲突的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程度必须得到考虑和处理。我国代表团欢迎捐赠界和国际金融机构正更加重视这一重要问题。我们把解决债务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债务问题现在已被广泛承认是造成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国家经济停滞和欠发达的一项重要因素。

秘书长正确地强调,贫困本身似乎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武装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有证据表明,当一个国家已走出冲突,走上冲突后缔造和平进程时,及时的国际资助对于帮助加强这一进程和预防冲突再起,至关重要。巩固和平中的一项关键目标必须是让在冲

突期间被破坏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基础设施能在一个从战争向和平的过渡进程中得到重建。

维持和平的复杂性现在已涉及一系列额外任务,使它成为一项真正的多层面任务。爱尔兰通过参加在科索沃和现在在东帝汶联合国授权的多国部队行动,已在这些新的安排中发挥作用。我们欢迎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保证,正在采取办法,更为有效地协调这些多种活动。

我们赞扬秘书长的报告质量非凡,赞扬他概述为何从反应文化过渡到预防文化并非轻而易举的原因。联合国可以成为促进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它可以通过它所掌握的各种工具,向走出冲突的国家提供非常宝贵的资助。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维持人的生命,不论是在自然灾害后,或是在冲突迫使人民背井离乡的地方。

但是归根结蒂,避免预防冲突的最佳办法,实际上或许是唯一的办法,是让社会所有成员都感到参与其中。正是这种参与感才能提供能够容纳深刻分歧的办法。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强调,和平、发展和人权都是相互关连的。这三者之间的正确平衡是每一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争取达到的。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在这个五十四届会议上,我想代表我国政府对柯菲·安南秘书长在管理本组织的工作并在本世纪结束时使其获得成功结果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深切感谢。我们非常赞赏正在审议中的报告。报告的实际方面清楚地反映了秘书长在领导本组织方面的广泛经验。

报告清楚地表明联合国的重要性和需要遵守其崇高目标。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的看法。他确认了和平与稳定之间、经济发展、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还直言不讳地和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冲突的根源:一些国际冲突是由于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因素引起的,而其他冲突则产生于人为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预防战略,他将这种战略称为预防文化。那些战略应是本组织各级工作的基础。在那些我们希望能够有效地防止战争灾难的最重要的战略和措施中,我们应提到早期警报系统和处理任何国际问题的有力措施。

然而,我们呼吁非常慎重地研究这个观点,以便确保它不违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我现在想谈到科威特人所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每天都经受的痛苦。这就是科威特和其他第三国的战俘和被拘禁者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感谢秘书长在这个人道主义问题上表现出的同情心和关切,这产生于他对实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责任。

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中,秘书长重申,伊拉克必须全面实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那些与科威特战俘和被盗窃的财产有关的决议:

“我们的主要要求仍然未变,就是伊拉克必须充分遵守所有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必须使国际社会放心,伊拉克不再有研制和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必须查明失踪的科威特公民和第三国公民的下落;必须归还科威特的无法替代的档案。”(A/54/1,第81段)

秘书长报告的内容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九年来,伊拉克没有遵守关于解决这个人道主义问题的要求。安全理事会为估价伊拉克对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遵守情况而成立的第三个特别小组的工作结果及其报告第48段确认了这一点。这个报告说,伊拉克的合作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持下设立的三方委员会和作为其一部分的技术小组委员会会议期间。

此外,伊拉克今年1月宣布,出于纯粹的政治理由,它将不再参加技术小组委员会的会议。此外,伊拉克否认无辜战俘的存在,尽管有证据证明他们被强行拘禁并通过红十字会向伊拉克提出了这方面的书面证明。

由于这个问题影响到无辜者的生活,伊拉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正在增加科威特人民每天遭受的痛苦。或许应该在此指出,共有605名战俘。在这些人中,481人是平民,124人是军事人员。这个数字包括7名妇女和124名学生。这个总数中的345人在被逮捕时是在14岁和30岁之间。这些统计数字向所有人表明科威特的每个家庭中所感到的巨大痛苦。因此,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向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其进行认真和有效的合作,以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并出于人道主义和道义上的考虑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代表科威特政府和人民感谢在一般辩论期间谈到科威特和第三国战俘问题的所有国家。所有国家都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对人的一切形式的痛苦有关心和同情,无论这种痛苦是由于制裁、战争、拘禁、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科威特断然反对在处理人道主义问题时的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没有比战俘、

被拘禁者、或失踪者问题更重大的问题。我们是在启示宗教的戒律和人制定的法律指导下处理这样一个问题的,以使这些战俘能够与自己的家庭团聚或查清这些战俘的下落。

恩赫赛汗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它除其他事项外还涉及到日益严峻的预防战争和灾害的全球挑战。我们认为,报告是简明的,突出了本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的主要活动。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析性的,也是发人深醒的。它涉及到下一世纪将出现很多挑战。我们认为,报告是我们辩论的良好基础。

鉴于报告中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将在全体会议这里以及在各主要委员会中分开讨论,我今天要谈一下下列问题。

蒙古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在其报告引言中强调了从反应文化过渡到预防文化的问题。正如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国际社会在1990年代中除科索沃和实际参战国家的费用之外的七场重要战争中的费用,为1990亿美元。这并未反映出人的生命的损失或人的痛苦。根据卡内基委员会的统计,如果更多的注意预防,则大部分这些费用可以节省。我不想长谈这笔巨款如何可用于发展、保健、教育等目标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秘书长在其报告中集中注意避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特别是战争和武装冲突。

关于预防战略的一节正确指出:有关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单一原因的解释过于简单。因此,预防战略需要一种多层面的做法和类似的合作。对该报告为多层面的办法提出的强烈理由,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同样,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从反应到预防的不断变化的做法。鉴于这一情况,安理会最近就诸如冲突后建立和平及非洲局势等问题举行了几次公开辩论。联合国会员国对此做出了积极和支持的反应。我们认为这一做法应得到推行、发展和丰富。

一般性辩论清楚地表明,因清楚地确定联合国在对国际紧急情况的反映中的作用,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引出很多微妙、可进行辩论和相关的问题。它们包括国家主权、面对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而采取武力行动的道德必要以及很多其他问题。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的阐述,即没有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执法行动威胁到基于《宪章》的国际安全制度的核心。

在一般性辩论中公正地提出而且也适当的反映在秘书长报告中的另一个问题,这是国际社会在对人道主

义紧急情况做出反应中的不一致性,该问题在很多论坛中公正地提出来,包括安全理事会最近在审议有关非洲局势的进度报告时。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道德的原则应根据人的需求标准而平等地适用。

报告清楚的显示出维持和平性质的改变,它正具有符合正在形成的安全的整体概念和实现的办法的多层面特点。联合国及其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按照报告的认识,正继续扩大。所以蒙古铭记其作为国际社会一个成员的义务及其根据《宪章》所做的承诺,于上星期同联合国签署了一项有关待命安排的谅解备忘录,它据此将在今后参加联合国的行动,提供参谋人员、军事观察员和医疗人员。

在谈到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时,秘书长指出他从最近的经验中所汲取的下列三个教训:如果保持国际安全制度的合法基础,各区域安全行动就必须由安全理事会授权;在一个区域起作用的安全政策可能在其他区域不起作用;以及当今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需要同样复杂的部门反应,这种反应要具实效,就需要充分的人力和财政支援。我们完全赞成这一结论。

秘书长的报告明确表示,正是中小国家成为冲突局势的目标和受害者。正是这些国家最需要发展援助或人道主义援助。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联合国对它们是十分重要的、或许是不可或缺的机构。由于这一原因,这些国家真正关心在下一千年初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及其效率。因此,这些国家正是通过这一折射镜而看到联合国的改革,以及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和其他联合国机构需要发挥的作用,按照这一脉络,我国代表团同很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正期望看到秘书长关于千年大会的报告。

联合国的表现取决于其成员国的表现。因此,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做出自己的贡献。蒙古正争取在它能够起到那怕是微薄的影响以及能够做出最大的有意义的贡献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已经提到我们对维持和平行动的承诺。蒙古还在其他几个方面积极活动,包括不扩散和建立信任方面。蒙古位于两个核大国之间,过去曾卷入它们的争端,我们已经宣布为无核武器国家,并正争取使这一地位制度化。这不仅将使蒙古成为无核武器国家,而且还会使其更加可预测,从而有利于推动建立信任和区域稳定。

最近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注意的问题之一,这是人的安全的概念。很多代表团提到人的安全,这是一个比国家安全更广泛的概念。后者今天显然不足以面对新的安全现实,因此不能充分满足新的安全挑战。该人类安全概念似乎符合秘书长在其去年的报告(A/53/1)中描述的“通盘安全概念”。该概念以个人而非国家为焦点,它以个人的实际生存、他或她的日常生活和人的尊严为焦点。该概念包括贫穷、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难民问题和传染病问题。一般性辩论已明确表明,各国今天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同人类安全有关。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小心谨慎,不要不适当地扩大这一概念的范围,因为这样做可能产生各种影响,会实际上破坏安全的宗旨。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秘书长可以通过任命一个专家小组,对这个新产生的安全概念进行全面研究,那将十分有益。此类研究过去曾证明有益于使问题概念化,并有益于确定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手段。因此,联合国已在1975年进行了一项有助于确定建立无核武器区概念的重要研究。除了专家们的意见外,国家的意见也对使这种研究真正具有宝贵价值必不可少。

蒙古自1994年以来一直作为国策而采纳的国家安全概念确定了蒙古的广义安全,其中除传统概念外,还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人口健康及其基因库和生态安全等概念。

我国代表团要简短地谈一谈秘书长报告的合作促进发展部分。我国代表团曾在去年评论秘书长的报告时特别指出,内陆发展中国家因没有人海通道和由此无法进入世界市场,而存在固有的障碍。这些国家的任何竞争优势都被过份高昂的过境和运输成本所抹杀,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成本几乎占总成本的40%。虽然我们很清楚,秘书长的报告必须简明扼要,但确实令人遗憾的是,今年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十分重要——对大都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将近30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下一份报告将论及这个问题。

我国代表团没有谈到许多其他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国际安全、国际法、发展和融资等具体问题。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在适当论坛阐述这些问题。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对秘书长旨在改革联合国和使其在下个千年更加有效和更加相关的各项活动再次表示完全支持。

秦华孙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谨对联合国秘书长就联合国工作提交年度报告表示感谢。这份报告涵盖了本组织年度工作的方方面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年来国际风云的变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最近几年来,一些国家陆续发生了造成大批平民流离失所甚至流血伤亡的冲突和危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代表团认为,制止这样的冲突和危机,消除其根源,是有关国家人民的强烈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但是,目前出现的“人道主义干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却将人权和主权对立起来,甚至有些国家或区域组织在尚未达成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已在大行其道,这是值得警惕的。我们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形势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绝没有过时。偏离或违背这些原则,主权将被任意弱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将严重受到损害,甚至不复存在,势必在国际关系中造成危险的后果。

在当今世界上,有意愿、有力量到处干预别国事务的只有极少数富国、大国、强国。而对于穷国、弱国而言,主权是它们保护自己不受欺负的最后屏障。如果把这道屏障突破了,就会为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的行为开绿灯。世界将永无宁日。这与各国人民在冷战结束后要求减少冲突和危机的善良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和争端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经安理会授权来干预,还是任由个别国家集团自行其是,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而且,冲突和危机有各自的复杂起因。如果外界干预不但没有缓解局势,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怎么能说明干预是正确的呢?如果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任意进行干预,但实际上却造成更大的人道危机,又怎么能使人相信他们的那些所谓“理由”呢?

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些国家十分热衷于插手个别地区事务,但对此前在其他地区发生类似问题却置若罔闻。人们不禁要问,对不同地区采取双重标准,厚此薄彼,又怎能证明干预是公正的呢?如果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实际上却在谋求战略的、军事的、经济的一己私利,就更值得世界人民警惕了。

“人道主义干预”问题是一个新的概念,各方对此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进行讨论是必要的,现在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讨论应该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如果认为《宪章》所体现的根本准则已经不再适用,将其抛在一边,我们的讨论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世界也只会变得更

加混乱。我们希望在《宪章》精神的基础就这个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以达成真正有利于各国、至少是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国际共识。

秘书长在报告中强调:

“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将危及《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根本核心。在使用武力方面,唯有《宪章》提供了普遍接受的法律依据。”(A/54/1,第66段)

他还指出:

“如果不承认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的根本基础就会成为疑问。”(同上,第69段)

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共识,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当前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更多地承受了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冲击,更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国际社会应当从全局出发,通力合作,以支持有关国家融入全球化的努力。为确保所有国家从全球中公平受益,我们赞赏联合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我们希望,联合国根据新形势的需要深入探讨全球化给消除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具体消除贫困的战略。希望联合国的发展业务将消除贫困作为其首要任务。

中国代表团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应当切实地遵循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一些国家和集团根据其政治、经济利益取向,对人道救援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造成人道援助失衡。特别是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灾难长期以来得不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和充分的支援。这种状况是极其令人担忧的,我们希望,这个倾向能够尽快得到扭转。

中国政府承认并且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同时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必须与各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保护人权的唯一模式。各国在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优先事项安排及具体做法上可以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应影响和阻碍各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交流和合作。人权问题的政治化和采取两重标准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尊重人权,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一年来,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系列消极事态的发展严重恶化了国际安全,也阻碍了多边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健康发展。在导弹问题上,最突出的消极事态有两个方面。其一,有关国家发展和扩散导弹防御体系,构成了对国际和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威胁,动摇了核裁军的基础和前提。其二,个别军事超级大国肆意对发展中国家使用其最先进的导弹,使导弹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之一。这些事态发展,促进了导弹的扩散。

秘书长报告中还应特别提到个别国家关于反导弹体系和外空武器的发展计划。我们希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重新成为多边军控领域的热点和紧迫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应当能够尽早地启动。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发挥作用,推动现有的裁军条约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

明年,联合国将召开千年大会,和千年首脑会议。人们正期待着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然而,新的千年来临并不意味着旧的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会随着上个千年的流逝而自动消亡。我们面临的挑战正在不断增加,联合国依然任重道远。相信在全体会员国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将能够继续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下,在新的世纪,焕发新的生命。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们谨再次赞扬秘书长就联合国组织工作提出了全面而周详的报告。联合国近年来面临的挑战变得更为复杂,而联合国作出的反应也更为复杂。的确,报告内容十分详尽。例如,我们应当按报告第158段提出的情况,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打算为女童教育发起新的10年倡议。例如,女性受过教育的人口能够大大有助于消除贫困的方案。

秘书长9月20日在介绍报告时强调了唯一的一个要素:以新观点看待人道主义干预概念及其对传统主权概念影响的必要性。他当时详细阐述了他以前于1999年9月18日在《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讨论的一个主题。这个问题提得正是时候。非常巧合的是,新加坡外交部长9月24日在大会发言时也讨论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希望在本次辩论中,他的讲话将再次引起注意。我高兴地指出,墨西哥大使今天早些时候提到了那次讲话。

各方对秘书长所讲的话作出了迅速而有利的反应。一些国家说,主权原则是我们抵御强国与弱国关系中不公正现象的唯一屏障,削弱这一原则会导致霸权主

义猖獗。主席先生,你也评述说,人道主义干预的想法不仅是令人惊讶的,而且实际上威胁到国家主权的存在,有损《联合国宪章》本身的神圣原则和宗旨。另有一些国家确认有必要根据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重新考虑我们对这一原则的传统看法。它们说,国家主权固然重要,但个人的主权也很重要;在重新认识一项原则的时候恰好重新定义另一项原则,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这两者的的发展甚至不必被视为不可能相交的平行关系,因为实际上它们是交汇的。这些看法都已在大会这里的发言中得到表达。

显然,意见分歧已经出现。双方在辩论中认为各自都有道理。的确,双方都有合理的论点。主张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人说,在当今世界中,距离已经消失,世界任何角落,从索马里到科索沃,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能够即刻通过电视广播传送到我们的起居室,因而难以想象人们会放任不管,不对任何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反应。因此,他们说,国际社会有义务进行干预,即便这意味着损害有关国家的主权。

主张保持主权的人也提出了同样有力的论点,对此我阐述如下。主权概念的确立不是为了保护强者,而是为了保护弱者。在《联合国宪章》和主权平等概念还不存在以前,弱肉强食的法则横行世界。强者很自然地以弱者作为吞食对象,因此,人道主义干预的理论可能会使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一项进步出现逆转,因为它会再次使强者可以干涉弱者的事务,而弱者永远不会被容许,而且也没有能力干预强者的事务。如果一国的法律只适用于弱者,而不是强者,那么不能说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同样,必须把人道主义干预理论视为会不公平地影响弱国和强国的国家。有哪个发达国家会在原则上或实际上允许他国在其本国领土内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我所作的以上叙述可以表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然而,现实情况更加复杂。问题没有突出到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坚持绝对主权与完全放弃主权两者之间进行抉择的地步。主权的确是目前国家体系的关键原则,也是联合国所依据的前提。但是,在实践中,主权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国家体系不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得不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约束自己的主权。实际上,我们在一道努力解决诸如环境、贩卖妇女和儿童及跨国犯罪等问题时,也将我们的某些主权放在从属地位,甚至放弃主权。

诚然,人道主义干预是一个要敏感得多的领域,因为它更加直接地牵涉到各国的权利和内部事务。但是,仍然摆着的事实是,目前在国际法中存在着两种流派,今天,

以传统主权概念为标志的一种流派与强调个人权利和人权等问题的第二种流派很尴尬地同时共存,今天,个人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合法主体。此类思想流派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不能靠坚持绝对的主权法律概念来凭主观愿望使之消失。

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也引起了其他实际困难。首先,在一些情况中,安全理事会不能采取行动,因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不能达成一致。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正在进行。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指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能够在任何现实的时间范围内有很大的改进,尤其是在否决权方面。但是,很显然,在人道主义灾难或灭绝种族行为由于种种原因而发生的时候,许多国家不愿意坐视不管。第二个困难是,即使在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同意的情况下,许多会员国也感到不满意,因为在它们看来,安理会就何时干预或何时不干预所作的决定是临时性的,甚至有时实际上是变化无常的。

国际社会的这些想法是不能忽略的。它们是政治现实。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待它们。世界已经变得极其复杂而且彼此密切相联,因而国际体系不能由霸权势力或大国和强国集团来控制,即便这种权力是在安全理事会授权情况下合法行使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认真解决联合国许多会员的担忧,我们就会将联合国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且在联合国以外的国际体系中制造不稳定。

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那样,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办法是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在提高透明度和实行更民主的决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显然不足以满足大多数会员国的要求。我们还可以研究德国外长菲舍尔先生所提出的建议,即应该始终要求五个常任理事国对它们动用否决权作出解释。他说:

“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是根据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授权,并且代表会员国行事的。但是,迄今为止,会员国没有权利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行使其否决权。这不仅既不民主,又不公开,而且使某些国家能够轻易地因本国利益而非国际利益单方否决决议草案。要求一个国家承担起义务,向大会解释其否决决议草案的原因,会使上述情况难以发生”。(A/54/PV.8,第10页)

在不远的将来,如果安全理事会面对真正的危机再次处于瘫痪,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要求大会审查这个问题?大会的重要优势在于,它是一个普遍性机构。它的工作方法要透明得多。在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之前,是否应该

为此建立政治共识?当然,这有不利的一面,因为在应付迅速发展的危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拖延。但是,这必须与就这些行动达成更广泛政治共识的重大政治好处结合看待。大会的决定没有约束力,但是由于大会的成员组成具有普遍性,因而它的决定甚至可以比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更能够赋予合法性,更能够建立共识。由于我前提到的两种国际法趋势同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也许应认真地辩论和讨论如何在大会中就采取快速行动的必要性及达成政治共识的必要性之间求得平衡。

简言之,随着人道主义干预新概念的出现,我们确实面临一个复杂甚至混乱的问题。我们应赞扬秘书长敢于提出困难问题的勇气。现在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应该提供答案,因为承受后果的将是我们。

弗朗切塞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意大利要与大家一起赞赏并感谢和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出色报告。这一报告强调了意大利也完全认同的一个关键的关切问题:迎接当今的人道主义挑战。我们还同意这种看法:一个现代组织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而是要预防这种情况。

考虑到这一点,我将简要地谈一谈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联合国的基本责任,在秘书长的报告中,这些责任被放在了高度优先的地位。

首先,秘书长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描述提供了一幅分裂的画面:当国际社会正在加深其对世界和平的承诺时,联合国在试图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困难。秘书长对科索沃教训和对非洲的许多悲剧性冲突的反省尤其促使我们重新审查联合国未来的作用。

联合国采取行动往往受到安全理事会中威胁使用否决权的阻碍。事实上,“隐蔽”的否决,而不是公开的否决,是今日安全理事会工作方式方面的真正问题。还存在着会员国政治意愿方面的危机。我注意到秘书长提到三个因素:

“会员国认为这个冲突并不涉及重大的利益,所以不愿意派军队去冒险,又担心费用问题,并且……怀疑干预行动会成功”。(A/54/1,第41段)

这些考虑因素不应该使我们削减联合国的合法作用。相反,它们应使我们通过对本组织进行改革,以及在适当的场合通过协调与区域组织的行动来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因此,意大利坚决赞同秘书长就实现和平与安全的

艰难任务和当出现了粗暴、蓄意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时国际干预应如何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作出平衡所说的话。

就意大利而言,目前它有10 000名军事人员部署在从科索沃到东帝汶的维持和平行动中。而且我们多年来也一直在深入参加改革联合国的工作。因此,我们欢迎其他会员国参加共同努力,以确保联合国拥有它所需要的资源和适于执行在第三个千年期将托付给它的任务的新结构。

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行动对迅速恢复和平和减少人道主义紧急事件的受害者人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意大利继续支持促进诸如我们在几年前签署的待命安排的努力,以赋予联合国迅速作出反应的实践能力。为了进一步确保维持和平行动的效率 and 及时性,意大利仍愿意参加区域框架内的国际特派团;它申明,当我们国家的利益没有面临直接危险时,它也愿意支持在远离其领土的其他区域的维持和平行动。

恢复和平的努力除非伴有奠定持久和平基础的援助方案,否则将没有多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应该对冲突后缔造和平给予更优先的地位,和为什么我们与其他会员国一起正在作出重大的努力,以便向联合国提供能够了解并尊重当地的需要并为国家机构的恢复做出有效贡献的合格的警察部队。

同样重要的是在冲突一结束后立即收回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销毁武器的方案。为此目的,意大利颇感骄傲地为在阿尔巴尼亚成功实施这样一项试验行动做出了有效贡献。

在发展合作领域,意大利热情地支持秘书长报告中发出的建立一种预防文化和实施需要在跨机构和部门的广泛领域进行合作的预防战略的呼吁。联合国系统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是在政府间组织一级,还是在本组织内,都应该充分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同意这么一种看法: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在发展领域拥有非常的能力,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更为有效和协同地使用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对该报告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主动行动的作用可有可无时竟掩饰不住某种惊讶的原因。在诸如根除贫穷、非洲发展和冲突后缔造和平的关键领域,情况就更是这样。

例如,关于消除贫穷,该报告仅在第145段顺便提到了去年七月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日内瓦届会,随后仅提及在该届会上提交的报告。竟一字不提该届会的结果。此外,我们从第146段中得知,联合国发展集团正在

拟定一项新的主动行动,以帮助方案国实现到2015年将绝对贫穷削减一半的目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这一类型的值得称赞的主动行动正在实施时,为什么联合国的政府间方面竟被蒙在鼓里?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事例,是因为它们因原本详尽的在秘书长报告中对其他大多数领域和各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之间的有效和富有成果的合作所付出的关心和智慧而显得更为清楚。

在传播领域,许多重要的技术创新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地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这种史无前例的时刻对所有大型组织均提出了要求,人们越来越多地根据它们的迅速和有效的传播沟通能力对它们作出评判。这是一个联合国必须顺利应付的挑战。意大利完全支持新闻部在联合国总部和在遍布世界的各联合国新闻中心,通过使用诸如光纤电缆、因特网和更有功效的计算机等新技术,加速传递联合国新闻的所有努力。

全球电视的发展已引起人们对即时新闻不仅仅对工业化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新的担忧。世界电视论坛为新闻制作人员和新闻提供者共同参加关于传媒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利和责任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在国际法律秩序和人权领域,意大利真诚地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作的评价。我们深信,联合国正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关键作用。我们真诚地赞同这样的看法,即这些问题在本组织工作的总方案内贯穿着各领域。

在过去五十年里,世界各国已经制订并批准了一系列给人印象深刻的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文书。但是,任何规定均受到其适用范围的限制。纸上的文字并不能确保捍卫人的尊严。这是为什么意大利一直是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坚定支持者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站在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项目的前列的原因。我们仍相信这些机构的威慑影响,相信必须对起诉和惩罚人类所知的罪大恶极的罪行的日益增长的要求给予回应。因此,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表示的观点,即去年在罗马达成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协定是

“国际合作促进人类福利和普遍实现人权历史上的分水岭”(A/54/1,第260段)。

我们相信其他许多国家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因此欢迎秘书长呼吁那些仍未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

会员国批准这一规约,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执行这一规约。我们赞扬筹备委员会在为未来的法院编写《程序和取证规则》和《罪行要素》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该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上必须继续迅速和有效地开展工作,以遵守罗马会议规定的2000年6月30日这一最后期限。

兰贝托·迪尼作为意大利外交部长,两个星期前在本大会堂声明,应采取有效行动,预防并遏制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行爲,这是所有旨在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律体制的真正含义与目的。我们衷心希望,新的千年将预示着人们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义务与期待。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今年与以往两年以样,秘书长有机会在一般性辩论开始时,介绍其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这是一种可喜的安排,应当在今后继续下去。

我国代表团尤其高兴地看到,今年的报告确认了今后一些年对国际社会具有潜在挑战性的一些问题。一年前,我国代表团曾请秘书长特别关注我们的类似建议。

秘书长的报告可读性更强,而且以一种极为方便用户的方式广泛描述了这一世界组织的各种授权活动。对实质性和机构改革问题都给予了适当重视,并请人们注意,联合国会员国要想看到效率和效力,必须在这两方面作出全面和透彻的考虑。

孟加拉国满意地看到,秘书长建议会员国信守那句古老的格言,即防病胜于治病,而对于冲突与问题,不仅要治表,还要治本。他关于从反应文化走向预防文化的论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制定预防性战略需要清楚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同意他所说的应通过预防性部署和预防性裁军补充预防性外交。

孟加拉国相信维和是预防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我们坚信只有具备了明朗的政治方向,联合国的明确授权以及有效的指挥和管理结构,才应开展维和行动。

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其今年的报告中注意到,自然灾害和暴力冲突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最基本原则的强调是极为重要的。

联合国的发展任务对孟加拉国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满意地看到在题为“合作促进发展”的一章中对这

方面给予了注意。我国代表团去年曾建议,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应更多着墨联合国发展集团的活动。我们还建议,应在报告中纳入经济及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就发展指标开展的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年的报告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论述。

在消除贫困一节,孟加拉国去年曾建议纳入联合国与微额信贷有关的活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价值4000万美元的微创方案。今年的报告提到了微额信贷高层会议及其目标,但未能充分重视微额信贷活动对消除贫困和赋予妇女权力的影响。我们认为,秘书长在他今后的报告中,应当强调微额信贷正在显现的重要作用。

我们赞赏秘书长努力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伴随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它所谓的“非民间社会”活动的跨国性,但报告没有适当谈及在全球进程中面临边缘化威胁的发展中国家的忧虑。

孟加拉国高兴地看到,报告中对问责制和监督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我们鼓励这一点应在今后持续下去。对改革进程及其在运作中取得的成果的监测,要求会员国给予密切关注,并应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定期报告。

孟加拉国欢迎报告中强调和平、发展和人权观念是相互联系的。报告提醒国际社会警觉其活动和倡议在人权方面的紧迫性。今后,我们希望秘书长留出一些篇幅,论述与和平文化有关的活动,特别要将其与世界各地涉及整个民间社会正在进行的活动相联系。

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秘书长的面面具到的报告,我们相信会员国在本次报告中阐述的建议和想法将继续反映在今后的报告中。

夏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你指导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进程的方式向你表示赞赏,并预祝你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就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及其发人深思的内容向他表示感谢。我们非常认真地考虑了9月20日他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和想法。对这些想法,应当进行深入讨论和审查。由于时间限制,我只想谈到其中几个问题。

应通过国际关系加以推动的首要目标是利用在促进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国际机制在更大的自由中促进社会进步并提高生活水平,确保持久和平并避免冲突以及通过全球道德规范和平等预防强国欺凌弱国。它要求尊重社会和文化多样性、政治主权、经济期望和脆弱性,总之,要求那种为各国家和人民每一个成员带来真正自尊的身份感。它排除了一切形式的强

迫和支配地位。这一原则是赖以建立联合国之家的基础。因此,国际社会在实现所有期望前不能自满;国际社会不能半途而废。

因此,我们非常赞同秘书长所说的

“我们对和平的承诺也不能因敌对行动结束而终止。战争的善后工作需要同样多的技巧、同样大的牺牲以及同样多的资源,以便缔造持久的和平,避免暴力卷土重来。”(A/54/PV.4,第3页)

我们还非常赞同这一发言背后的精神。我们感觉到了这种精神。

印度一向极其重视在完全尊重大会第46/182号决议规定的指导原则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尽管遇到资源的约束,我们仍然以南南团结的精神向受自然灾害和其它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影响的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最近的例子是,我们向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勒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苏丹、塔吉克斯坦和受米奇和乔治飓风影响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人民提供了援助。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并没有寻求人道主义援助,而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通过本国的努力应付我们遭遇的自然灾害。我们感谢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及影响印度的一些自然灾害这种同情姿态。

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所持人道主义援助不应被媒体报道、政治和地理驱使的观点。人道主义援助的唯一标准应该是人的需要。否则,正如秘书长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忠于这一道德规范,被人斥为前后矛盾是最好的了,最坏的时候会被斥为伪善。报告再次强调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资金的极不平均的地域和部门的分配。秘书长在另一份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种不平均的提供资金情况有可能破坏人道主义援助的根本原则,即援助的提供应该不带有政治考虑。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纠正这些不幸的反常现象。

秘书长指出,在许多国家,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受到影响,原因是有人蓄意把矛头指向文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并且不让人们得到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种蓄意把矛头对准他们和不让人们得到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是由于人道主义援助被看成是偏袒某一方,因而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显然,人道主义援助的安全和保障不会受到联合国公约上的签字的保护。只有人道主义援助被认为真正不偏不倚和保持中立,是在大会明确阐述的指导原则下提供的,其安全和保障才能有保证。

我们赞同秘书长提出的国际社会没有对人道主义紧急状况作出前后一致的反应的看法。我们继续认为,对少数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不适当的集中关注扭曲了全球观念。毕竟,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联合国估计1998年超过900亿美元——远远超过战争造成的损失;可预防和可治疗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我们不应忘记,武装冲突不是影响今天世界上千百万妇女、男人和儿童正常发展的唯一力量。最穷国家被边缘化产生的经济排斥和社会绝望的无情力量使得更多的儿童不能享有本应使他们能够成为明天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明天的问题的童年。

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可能加剧了这种区分。仍有千百万人死于可预防和可医治性疾病。在非洲广泛流行艾滋病的时候,跨国公司却根据苛严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收益要求,使得无法向有需要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病人提供救济,给非洲国家在这方面带来不必要和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正如我们准备在第二委员会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作用问题的辩论中强调的,不动员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应该被视为当代肆无忌惮的恶行。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说法,即软弱的政府没有什么能力阻止暴力的发生和蔓延,而新闻媒介常常传播的蓄意挑起仇恨行为可能促使战争倾向转变为实际的战争。新闻媒介常常为民族情绪和偏见服务,是有选择性的,要么就是目光短浅的。新闻媒介操纵事件,选择公众注意的中心,将其他问题抛在一边。它们挑选并制造所谓的事实,而把其他资料掩盖起来。他们编造政治上有利的事实。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冲突战场上看到独立新闻媒介扮演了权力的应声虫的角色。

秘书长提到早期预警、预防性外交、预防性裁军和冲突后建立和平。瑞典外长正确地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缺乏了解并不是采取行动的真正障碍。

秘书长指出缺乏的是使用武力的政治意愿。我们坚信日益抬头的干预主义的念头利用人道主义关切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或借口,有可能加剧国家之间和国内的冲突。这种念头不可能游离于经济或政治考虑之外,很可能使过去时代的不安全卷土重来。发展中国家由新生主权国家组成。新世纪到来时不应出现新的北南分野这种可能性。对人道主义危机的重大关切不应忘记这样的事实,即人们往往以政治眼光看待采取的行动。

在某些逆流而动的人拥戴那种支持对种族群体强制同化或分离、而不是支持尊重人类多样性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社会的意识时,也能听到要求干预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被某些人认为是人道主义行动的事可能被其他人看成是战争罪。显然,为处理人道主义问题采取武装干预这一原则的出现使我们处境危险,这是因为,至少从原则上说,武装干预将没有界限;因为其根本前提是建立在世界各地的问题都能通过外来势力解决这一暧昧的假设之上;因为无论联合国还是国际社会都没有这样做的资源和能力。

在联合国处于政治和财政危机之时,我们应加倍提防当今国际分裂状况恶化。另一个危险是为干预寻求正当理由的各种干预理论以及使用武力来反对所谓的压迫,最后结果可能是加强隐蔽的干预主义者的力量。

联合国必须侧重其 188 个会员国中大多数会员国关注的问题,这些国家仍在应付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挑战。我们希望侧重巩固各国的成功,并把失败国家的背离现象作为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努力应是促进加强国际合作发展方面的国际团结。应避免任何会恶化或加重错误路线的行动。我们应为国际社会有正当理由关注的问题寻找将发挥其集体智慧的答案。匆忙开出的江湖药方可使病情恶化。大会必须继续解决这一问题。

除非全球分配有所改变,否则无法消除阻碍持久和公正和平的贫困,因为这种分配没有促进和维护较穷国家的利益,因此也没有促进和维护我们共享的地球家园的利益。秘书长报告了与私营部门建立创新性伙伴关系的情况,以及加强与世界银行合作和联合国系统内更好协调的各项努力。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更重要的是努力纠正对发展中各国经济不利和不具支助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对多边发展合作的承诺减少,不论是以官方发展援助的水平衡量,还是以缺少具有活力的远见衡量,情况都是如此。在我们赞赏新的发展伙伴关系,包括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的同时,它们必须坚持联合国发展援助的根本特征,这就是中立、公正,在接受国规定的优先事项的基础上作为赠款提供。

如果缺少足够的资源,就不可能在消灭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有效进展,发展中社会不可能仅靠一些建议就实现繁荣。我们认为,民主、法制、透明和负责的治理、尊重人权、经济增长和发展是相互加强的。提供援助必须包含所有的成分。如果联合国寻求选择性的解决办法,仅仅依靠加强法律秩序或对纠正侵犯人权行为采取强制作法,我们将感到很担忧。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

各不相同,并不总是可用立法和强制办法来解决。例如,由于极端意识形态而造成的威胁人权的情况,就要求采取一个由更多方面的方法,而在现实中由欠发达造成的人权问题只有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才能解决。

维持和平不能不是联合国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尽管区域安排在帮助联合国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的努力显然应在《联合国宪章》第八条的框架内进行。维持和平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不应被视为替代国家建设这个任务。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论点,即冲突后体制如不能改善贫困人民的命运,就不能持久,我们也认为,需要专门拨出更多资金,用于进行在非洲的维持和平行动,这必须取决于各方的同意、维和人员的中立以及必须采取不侵扰的态度。我们注意到逐渐减少免费提供的人员所遇到的问题,并关注在工作人员招聘方面没有有效的过渡计划,来解决丧失连贯性和专门知识的问题。

简短谈一下制裁问题。我们一贯认为制裁是一种愚钝的办法,尽管有些人宣称制裁“很聪明”。必须经过最认真的考虑后谨慎使用制裁,而且制裁必须包括强制性、立即和可执行的人道主义豁免。

与秘书长一样,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由于少数几个代表团采取的不灵活态度而未能达成一项工作方案。感到遗憾。我们赞同和极力主张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目标。去年,在德班举行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上,印度提议在这本千年结束之前,最好在 1999 年举行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分阶段方案的问题,不结盟运动对此表示同意。尽管这一承诺有待履行,但让我们失望的是,从报告中似乎可以看出,联合国仍然更加全神贯注于不扩散制度,其性质和定义与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相比是暂时的,后者则是一个更值得坚定倡导和追求的目标。

我们感兴趣地阅读了秘书长报告中与全球化有关的部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各种力量近年来无疑重塑了整个国际经济框架,为某些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增长,却加重了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不确定性,边缘化和贫困。

全球化不可阻挡的逻辑,其前提似乎建立在各国政府退出市场,把经济发展留给企业界去进行,并把政府的职能降低到仅仅产生一个吸引外国和国内的投资,因而改变经济的有利环境上。期望国家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发展、投资与教育和卫生,并维持法律和秩序。

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审查国家将如何创造这些不同的条件时,显然可以看出匆忙的自由化可在许多方面限制国家的作用,使它用于处理巨大社会议程的收入大大减少,并使其面对很多危险,就象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一样。国家的社会和安全责任并不因自由化受益者的简单告诫而受影响。国家建设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智慧一向被视为处于中道。

我们认为,尽管我们寻求不同和持久的合作伙伴,现在的需要是加强伙伴国而不是进一步削弱它。在任何经济或政治危机中,对所有人福祉的最终保障是有一个负责和运作良好的国家。此外,正如印度外交部长几天前在这个讲台在一般性辩论中向大会发言时所说,只有各个国家强大才能组成一个强大的联合国。由弱国组成的联合国只能是一个虚弱的联合国。由弱国构成的世界秩序只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秩序。

联合国在接近新的世纪时具有广泛和挑战性责任。我们认为,所有会员国必须共同努力,使联合国更加民主和更具代表性,根据其《宪章》为共同利益运作,以便我们通过联合国能够协调我们的所有资源和精力。秘书处秘书长的出色领导下协助这种努力,忠实地反映会员国通过政府间授权转达的优先考虑,并促进《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我们承诺支持秘书长继续努力,使联合国对其大多数会员,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作出更多的反应,并相信所有会员国将表现出对联合国的支持,使之具有健全的财政基础。濒于破产或永远财政拮据的联合国至多反映政治破产的信息,最坏的情况则是反映了缺乏信念的信息,我们不希望发出的信息。

阿雷斯坦别科娃女士(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哈萨克斯坦代表团谨感谢秘书长编写并提出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A/54/1)。

我们十分仔细地研究了她的报告,认为这份报告内容十分丰富,载有关于本组织活动各方面的有益结论和建议。这份报告涵盖目前列入国际社会议程的广泛问题,我谨评论它的几个主要章节。

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以 61 段中提及的,1990 年代期间“战争和自然灾害依旧是个人和全世界人类社区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不幸的是,第三个千年即将到来,并未预示全球稳定。世界继续因区域和种族冲突而四分五裂,有核武器扩散的真正危险。日益明显的是,各国必须加紧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建立没有权力中心和分界线、对抗和摊牌、干涉内政和强加政策指令的多极世界。在这方面,我们

日益深信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并给予它代表国际社会作出有关强制性措施决策的专有授权。

本组织的另一个重大任务是通过使用预防性外交、预防性部署和预防性裁军预防武装冲突。经验已表明,使用有效的预防性战略可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关于建立预防性文化并就预防性战略问题同会员国继续对话的建议。

区域组织在确保国际局势长期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69 段中正确指出的,“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之间不能在防止冲突、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方面相互竞争。”只有相互尊重对方的优先考虑和密切合作才有助于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

为了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哈萨克斯坦一贯要求在亚洲大陆设立安全结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先生有关举行亚洲相互协调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洲信任会议)的倡议;这项倡议 1992 年 10 月在大会第一次提出。亚洲信任会议的多边会谈和讨论的成果是 1999 年 9 月 14 日在阿拉木图举行了亚洲信任会议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主管外交政策的政府官员签署了亚洲信任会议成员之间关系指导原则宣言。该宣言强调必须在主权平等、《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各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国家间关系。

因此在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亚洲安全体系的法律基础。在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安全的努力方面,这个世界极为重要。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以设立加强亚洲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广泛区域论坛。

我们感谢亚洲信任会议进程的所有参与国支持我们的倡议,并真正愿意共同努力来建立一个亚洲安全体系。我谨借此机会再次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对哈萨克斯坦的倡议保持兴趣并支持。

安全领域中独特合作的另一个例子是被称为上海五国集团成员国的联合工作。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五年前在上海开始的联合活动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亚洲大陆一大片地区的稳定因素。促进中亚区域安全的一个重要步骤是 1999 年 8 月举行上海五国国家元首级会议。其成员就边界管制、军事事务中信任和相互间减少边界地区武装部队达成和批准的各项协定有助于加强睦邻友好关系并积极促进保证该区域和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谈到区域安全,我们无法忽视存在着诸如组织犯罪和非法毒品贩运扩散的复杂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报告第249段中的结论,“消除非法作物和毒品贩运的全面战略……是以一项假设为基础,即毒品问题需要整体地处理,而这又需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及其各国与国际伙伴之间密切合作”。

哈萨克斯坦十分重视联合国最近几年采取具体措施以加强会员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实际合作。我们支持努力加强联合国作为这方面主要协调机构的潜力。我们还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加剧感到震惊。所有这些问题无法单枪匹马地克服,因为“不文明社会”的活动不承认边界;这种活动是跨国的。因此,打击这种罪恶的国际合作必须是普遍和全面的。

全球化对各国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影响最严重。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强调,全球化的挑战太大,不能靠政府和国际组织自己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迫切要求国际组织采取协调行动,有利于局势稳定和振兴经济发展的经济措施。

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欢迎扩大联合国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的对话,以期解决因全球化而产生的问题。认识到可持续发展进程的相互依赖性,我们支持联合国研究全球化不同方面——经济、社会、环境和性别方面的活动。我们认为,本组织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协调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过渡国家的发展援助,以促进它们融入世界经济。

哈萨克斯坦支持秘书长的努力,以加强联合国的效力和能力,适当应付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认为,联合国曾经而且继续是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独特的国家间机构。我们希望,联合国会员国能通过它们的协调努力,为在新世纪中加强和振兴本组织的能力作出贡献。

今天在我们讨论《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时,我认为应当指出,哈萨克斯坦充分履行它根据《联合国宪章》应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它作为一会员国的财政义务。1992年3月2日,当在我国加入联合国的那一天在世界最崇高的讲台上发言时,我曾特别荣幸地宣布,哈萨克斯坦充分承诺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与原则。

这是我以首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在这一讲台上的最后一次发言。我要借此机会衷心和最深切的感谢你主席先生,感谢秘书长和所有各会员国常驻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的支持、合作与友谊。

我在联合国八年期间,曾有幸依靠他们的这种支持、合作与友谊。

我将带着对本组织、对它未来的权威和它的不可缺少性的极大尊重和强烈信念离开总部,因为联合国对世界必不可少,因为它对我国必不可少。主席先生,请让我祝愿你、祝愿秘书长、各常驻代表和我们所有其他同事们在新世纪中取得新的成就和康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秘书长、我本人、并代表大会,祝愿哈萨克斯坦常驻代表今后工作成功。

比维罗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感谢秘书长及时提出他有关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秘书长以此履行他的职责,提请会员国注意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本组织在报告所涉期间状况。在感谢他的同时,我们赞扬他坦率地分析和他的领导所依据的坚定信念。

秘书长的分析和意见值得会员国最高当局的重视,因为他们有责任指导本组织,并在国际社会过去几年所经历的过渡时期中规划一条安全的道路。在一个充满人类成就的世纪结束时,我们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确保我曾经目睹的悲剧不在下一世纪重演。主席先生,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大会将能为此努力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委内瑞拉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在目前这一国际时刻,预防冲突占有头等重要地位。我们也同意,由于其复杂性,冲突的原因需要复杂的跨部门办法解决。最近事件已表明,现在的冲突越来越多属于国内性质。面对这些现实,委内瑞拉认为,解决这种冲突的复杂原因的首要责任在于各国政府。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赞成的因素,如善政、国内治安和人的发展机会均等等因素是国家主权固有的领域。同时委内瑞拉认为国际社会必须通过更大和更有针对性的国际合作,以符合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秩序的方式,承担促进预防冲突和紧急情况的责任。

因此,本组织突出社会发展课题所有各方面的努力是一个重要的前进步骤,它对和平与安全的潜在积极影响已开始得到承认。同样,打击非法跨国活动的努力——包括贩运毒品所有各方面的活动和对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刑事起诉有关的事项——也值得我们重视。

这些和其他例子说明存在广泛的国际合作领域,我们可以在其中逐渐发展一套理论和作法,以维持和平与安全,和谐地把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各自的责任相合起

来,不影响现有的各国和国际法律秩序,但在规范上符合它们的发展和演变。这样作是国际稳定唯一可靠的保障,它能够而且必将有益于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的解决。

同时必须承认,短期内可能出现因国内冲突或紧张局势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威胁国际和平的特殊局势。因此,委内瑞拉认为“早期预警”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

“早期预警是有效进行外交的一项必要条件。”(A/54/1,第68段)

因此我们相信,秘书长必须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以他在执行该领域各项任务时应有的审慎态度采取主动使本组织能够适当和及时地处理由于其紧迫性或可能的后果而值得关注的局势。早期预警应使本组织在《宪章》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

我们认为,摆在本组织及其会员国面前最复杂和迫切的挑战是防止武装冲突的原因,防止某种冲突的爆发或扩散,特别是避免给人带来的后果。仅仅在事件发生后作出反应不足以实现本组织崇高的价值观念,尽管我们不想低估这种行动的重要性和困难。预防是为不干预和尊重国家主权原则提供必要保障的最好办法。委内瑞拉认为,无论是对作为一个会员国本身来说还是对联合国来说,这种预防性努力都是必要的。我国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来促进这种预防行动,正象它在过去为我们区域中的和平所做的那样。

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年度报告是对我们审议会员国委托给本组织的所有事项的宝贵贡献。我们的发言集中于报告提请我们注意的很多专题之一,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专题特别有实际意义。然而,所有这些专题都同样重要,我国政府将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对其中每一个专题给予同样的注意和考虑,以期为加强本组织作出不断的贡献。

最后,让我再次赞扬秘书长所作的宝贵贡献,并感谢他在管理报告所涉及的这一年中的本组织事务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

下午1时散会